

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第二次科学讨论会论文

试论天地会

秦宝琦 刘美珍

一九七九年十一月

试 论 天 地 会

秦宝琦 刘美珍

天地会是我国清代主要秘密结社之一。最初活动在广东、福建，后来发展到台湾、江西、湖南、广西、云南、贵州等省，成为南方主要的秘密结社。道光以后，又在东南亚的华侨中广为传播。自乾隆中叶起，到辛亥革命，天地会的活动绵亘不断，此起彼伏，百余年间，发动和领导了多次反抗清王朝封建统治的斗争，并组织东南亚的华侨，反抗西方殖民者的残暴统治。在我国历史上，天地会留下了许多可歌可泣的篇章。

天地会的传会活动和抗暴斗争，多次遭到中外反动统治者的残酷镇压，清政府还专门制定了镇压天地会的条例。^①

但是，严酷的法律并未能阻止人们结盟立会，一批天地会的组织刚遭镇压，另一批天地会组织就又建立了起来。在保存下来的有关天地会档案中，可以看到天地会这个秘密结社的生命力十分顽强，任凭斧钺刀锯，始终傲然挺立，继续发展，真可谓“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

百余年来，天地会一直吸引着中外研究者，人们出于不同的动机，对天地会进行研究，写出了大量专著和论文。本文主要依据故宫博物院明清档案部所藏鸦片战争前有关天地会的档案，对天地会的起源、发展、特点、性质、作用等问题，作初步的探讨。

一、天地会的起源

天地会是由谁创立的？创于什么时候？这个问题历来众说纷纭。最早对天地会进行研究的是荷兰人施列格，（Gustave -

Schlegel) 施列格是荷属东印度政府的汉文翻译官。一八六三年, 荷兰殖民当局从爪哇巴东地方一个华侨家中, 搜获一批天地会文献, 交给施列格翻译。施列格利用这些材料及其它有关资料, 号成《天地会》(Thian Ti Hwei, The Hung League, OZHe-aven Earth League) 一书。书中第一章专述天地会产生的历史。施列格把《西鲁序》等传说作为可信的史料, 断言天地会系福建少林寺僧于雍正甲寅(十二年)年创立的。

后来, 国内一些人也对天地会发生了兴趣。辛亥革命时期。许多革命党人利用会党进行反清斗争, 陶成章便是最有名的一个。他本人曾加入过会党, 并把浙江、福建、江苏、江西, 安徽五省哥老会改为龙华会加入革命党。他著有《教会源流考》一书, “以供有志救世者观览焉”② 他在书中说天地会是明朝遗臣郑成功等人创立的。明亡以后, “志士仁人, 不忍中原之涂炭, 又结秘密团体, 以求光复祖国, 而洪门之会设焉。何谓洪门? 因明太祖年号洪武, 故取以名, 指天为父, 指地为母, 故又名天地会。始创者为郑成功, 继续而修整之者, 则陈近南也”。③ 这个说法在当时产生了很大影响, 许多革命领导人 利用这个说法, 进行革命宣传。当然, 这个说法并不是严格地根据史料的研究而得出的, 陶成章也并非进行单纯的学术研究, 我们今天就没有理由加以苛求了。

辛亥革命后, 许多学者对当时发现的天地会文献进行了整理和研究。一九三三年, 广西贵县修志局发现天地会文件一册。后来罗尔纲同志把它同《守先阁天地会文件》合编为《天地会文献录》。一九三六年罗尔纲同志发表《水浒与天地会》一文, 提出, “考天地会创始年代, 洪门相传, 始自清康熙十三年甲寅。”④

一九三五年, 肖一山从英国伦敦不列颠博物院抄录了一批天地会

② ② ②

支献，编成《近代秘密社会史料》一书。并写成《天地会起源考》一文，认为天地会“起于雍正甲寅之说为可信。”⑤

近年来有人开始利用档案和文献资料对天地会起源问题进行研究。一九六四年蔡少卿同志发表《关于天地会的起源问题》一文，着重论述了天地会创于乾隆二十六年的说法。他从研究林爽文起义的材料入手，对其中涉及天地会起源问题的两个重要史料作了分析。一是天地会成员许阿协等关于天地会始于乾隆三十二年的供词，许阿协等供称天地会有“木立斗世知天下”的歌诀。“木”字系指顺治十八年，“立”字系指康熙六十一年，“斗”字系指雍正十三年，“世”字因天地会系起于乾隆三十二年，故以世字暗藏。”⑥ 蔡少卿同志认为把世字解释为天地会创立的时间这个说法并不可靠，而解释为“隐喻乾隆三十二年清朝灭亡更为恰当”。⑦

一九七三年，日本学者佐佐木正哉发表《清末秘密结社》一书，他根据《钦定平定台湾纪略》中孙士毅的奏折，认为天地会始于乾隆三十二年。

蔡文提到的另一史料是汪志伊在《敬陈漳泉风俗疏》中所说的一段话，“查闽省天地会，起于乾隆二十六年，漳浦县僧提喜首先倡立，暗中指使，谋为不轨”。⑧

罗尔纲同志于一九三六年在《水浒与天地会》一文中曾提到过汪志伊这个说法，他说：“惟嘉庆初汪志伊《敬陈治化漳泉风俗疏》却以为起于乾隆二十六年”但“未知汪氏有何根据”，⑨ 而未采用。故蔡少卿同志在这篇文章中，着重论述了汪志伊的说法是“有根据的”。⑩

综上所述，到目前为止，关于天地会起源问题主要有五种说法。这些说法大致可分为两类：一类以天地会内流传的传说为依据，认为

天地会创于康熙或雍正年间；另一类则依据清政府官方的文献，认为天地会创于乾隆二十六年或三十二年。

天地会创于康熙或雍正年间的说法，尽管它依据的是天地会本身的文献，而且流传已久，并已为大多数人所公认，但是，我们仍然认为这个说法是不可信的。

首先，目前所能见到的史料中，有关天地会最早的记载，是在乾隆末林爽文起义初期。当时，闽浙总督常青奏称“逆犯林爽文住居彰化大里代，恃其山路险僻，丁族众多，平日窝贼，抢掠害民。并恐官府访拿，树党结会，共相帮护。凡入会者，令其对天跪地立誓，因取名天地会，并不写贴立薄，只以举指为号”^⑪。这是清朝官员最早提到天地会的材料。如果按照天地会创始于康熙或雍正年间的说法，到这时至少也过了半个世纪。这就发生一个问题，为什么天地会这样一个有反抗性的组织，在创立后半多个世纪竟从未发现过它的活动呢？

其次，这个说法的主要依据的《西鲁序》，它是出于天地会创始人之手还是后人附会之作，这个问题也是值得研究的。

《西鲁序》的抄本很多，内容繁简各异，情节亦多有不同，其大概内容是说康熙年间西鲁入侵中原，满朝文武莫能御者。康熙遂令发出榜文，布告天下，不论何人，只要打败西鲁，即可封爵得赏。消息传到福建少林寺后，众僧连夜赶到北京，揭去榜文，入朝奏请往御西鲁。结果，他们一举打败西鲁，得胜回朝。众僧不原为官，亦不受赏，仍回少林寺诵经修行。后来，少林寺僧惨遭奸臣陷害，大部因少林寺被焚惨死，仅有五人幸免，在神将帮助下，逃到广东惠州府，遇万云龙结为弟兄。其时为雍正甲寅年七月二十五日丑时，^⑫这个日子也就成了天地会创立的时间。

如果《西鲁序》确实出自天地会创始人之手，那么尽管这些情节

荒诞，也仍然是有价值的。我们可以对照有关史料，透过这些虚构的情节，去伪存真，找到一条了解天地会产生真相的线索。然而，无论从文献还是档案资料中，在嘉庆朝以前，都从未发现过一件《西鲁序》或与它有关或涉及其中人物、事件的史料。所以，很早就有人对《西鲁序》产生过怀疑，认为“当史地昌明之时。西鲁在于何地？何时入寇中国？史无明文，虚拟可知”^⑬

清政府在镇压林爽文起义中发现了天地会这个秘密结社，便对天地会成员严加搜捕，并追查其根源。乾隆皇帝见到林爽文起义军付元帅杨振国供出天地会起于广东后溪凤花亭的洪二和尚后，即传论孙士毅“查明后溪凤亭究在何府州县，即将洪二和尚并朱姓严密緝，迅速查拿”^⑭。后来，被捕的天地会成员许阿协供称天地会起于乾隆三十二年，又下令“证明此会起于何时，不必拘泥许阿协所供，以乾隆三十二年为限。”^⑮“密访严拿，痛加惩创，毋再稍留余孽。”^⑯于是，在福建、江西、广东、等省及台湾的官员们，纷纷追查天地会根源。

在清政府镇压林爽文起义，追查天地会起源的过程中，形成了一百五十余万字的档案资料，包括起义军的告示、军令、要任状，往来信札，天地会盟书及清政府官员的奏折，皇帝的批示，上谕等等，以及许多被捕起义者、天地会成员的供词。从这样一大批丰富的档案资料中，也从未发现过《西鲁序》或与它有关的事件、人物的材料。仅在严烟的供词中提到“这天地会闻说是朱姓，李姓起的，传自川内年分已远。有九龙纠集和尚四十八人，演就驱遣阴兵法术，分投传教。后来四十八人死亡不全，只有十三人四处起会。那在广东起会的是万和尚，俗名涂喜。如今在哪里？实不知道”^⑰。这个供词虽然也提到和尚“驱遣阴兵法术”后来死亡不全，到各省分投传会等情节，

但同《西鲁序》的内容相差甚远。当然也有可能《西鲁序》是在这个传说基础上丰富发展起来的。不论怎么说，直到乾隆五十三年时，尚无现在我们看到的《西鲁序》，充其量只是有了它的雏型。

我们现在见到的最早一个《西鲁序》抄本，是清朝官员于嘉庆十六年从广西东兰州天地会首领姚大羔家中搜获的。^⑮ 当时还没有《西鲁序》这个名称，而是抄在一本《会簿》的前面，《西鲁序》也许就是由此而得名的。《会簿》前面所载西鲁入侵以及少林寺僧惨遭杀害等情节，同后来的《西鲁序》内容大体相似，而具体情节又稍有不同，且较粗糙，显然还是初期的抄本。比如在谈到西鲁入侵时，仅笼统地说在“康熙年间”，第一次结盟则说在“甲寅年七月二十五日丑时”，而在较晚的抄本中，都把西鲁入侵的时间明确为康熙甲午即五十三年，第一次结盟明确为雍正甲寅（十二）年，以致造成了天地会创于康熙甲寅和雍正甲寅两种不同的说法。^⑯ 这些情况表明，姚大羔所藏会簿大概距其产生时间不会太远。我们虽然尚难以断定具体时间，但把它同嘉庆七年广东博罗陈烂侵四起义时布旗上所写的诗句来对照，发现许多诗句是相同或相近的。可见在嘉庆七年就有了类似的《会簿》。由此，我们大体上可以确定，《西鲁序》是嘉庆初年才有的，并非出自天地会创始人，而是出自后人之手。既如此，用一个嘉庆年间才编拟出来的《西鲁序》作为根据，说明天地会创于康熙或雍正年间，显然是难以令人信服的。

我们认为天地会创始于乾隆年间的说法基本可信。至于研究创始始于乾隆二十六年还是乾隆三十二年？从天地会本身来说，它做为一个秘密结社，初创时并没有多少人参加，规模很小，很难有准确的创立时间。即使有准确的创立时间，创始人为了避免惨遭官府迫害，也不会把它清楚地告诉会众，从而流传下来。同时，创始人为了表

自己组织的神圣和权威，总是把自己组织的创立年代说得久远些，宗旨神秘些，以便更有号召力。这样，要弄清具体的创立年月就更为困难。从官方文件来看，由于天地会初创时人数不多，活动较少，且极为秘密，并未引起清政府的注意，也未留下这方面的官方材料。因此，即使是在当时查清这个问题也是十分困难的。后来，清政府官员们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查遍了福建、广东、四川的大小城镇乡村，历时数载，直至乾隆五十六年，仍然说：“查天地会名目狂悖诡诞，而起自何人，何地，严切追求，终无确据。”^{②①}从现有材料看来，我们认为天地会创于乾隆三十年前后比较符合实际。

首先，我们从乾隆五十三、四年清政府官员追查天地会根源的情况来看，乾隆时确有提喜其人，天地会也确实是由他创始的。

乾隆五十四年十二月二十九日上谕提到，“据漳浦县报称，于该县高溪地方拿获僧人行义，供称伊师父提喜即系父亲，因乳名洪，排行第二，故名为洪二和尚，已于四十四年身故。”^{②②}

乾隆五十四年正月十七日上谕又提到：“据行义供，父提喜即洪二和尚，在观音寺为僧。行义本名郑继，后为僧改名行义。伊父在日曾教三指诀”^{②③}在陈丕的供词中又指出“提喜籍隶福建漳浦。”^{②④}

嘉庆年间一些大臣的奏折更进一步证实了这个问题。

嘉庆十二年闽浙总督阿林保、福建巡抚张师诚奏称：“再查闽、广、江西等省，天地会匪徒每以洪二和尚万提喜之名哄诱愚民。所称万提喜者，溯查乾隆五十三年闽省拿获林爽文案内之严烟，解部供出有万和尚，俗名涂喜，在广东传教。嗣经广东拿获涂喜之子僧行义，据供伊父即提喜，于乾隆四十三年身故，刨验骨殖属实。该犯又名提喜，又号洪二和尚，传授会诀以五点二十一为暗号，

并有逆诗嵌入洪字。”^{②④}

嘉庆十一年十二月十六日护理江西巡抚、布政使先福又奏称：“天地会起于提喜，该犯俗名郑开，僧名提喜，又号洪二和尚。”^{②⑤}

这些材料都进一步证明提喜确有其人，而且天地会确为他所创立。这就更加说明天地会是乾隆年间的产物，而非创于康熙或雍正年间。

其次汪志伊关于天地会创始于乾隆二十六年的说法，虽然尚属孤证，且不知其来源与根据，但是，汪志伊是多年在福建任职的专闾大员，两次奏称天地会始于乾隆二十六年，恐怕也非信口雌黄，这个说法还是有很大参考价值的。另外，初期的天地会成员陈丕还说他本人曾于乾隆三十二年与张破脸狗同拜提喜为师入天地会。^{②⑥}这些情况，也都直接或间接地表明天地会创始时间和最初传会时间，大约在乾隆三十年前后。

二、天地会产生的社会背景

天地会起源问题众说纷纭，一直未获圆满解决，固然由于史料缺乏所致，也由于人们对天地会产生的社会背景研究得不够，使这个问题囿于单纯对时间的考证，自然很难得出一致意见。我们认为，进一步探讨天地会产生的社会背景，有助于对天地会起源问题的正确解决。

蔡少卿同志在《关于天地会起源问题》一文中，对这个问题曾作了论述，他认为天地会产生于福建漳州地区，“从康熙到乾隆年间，漳州地区已存在着大量破产农民和破产盐民为主的破产劳动者”。

“由于这些破产劳动者的生活不安定，迫使他们感到，单靠个人是无法生存下去的。使他们感到，必须团聚一起，互相扶持，甘苦与共。在这样的情况下，象天地会这样一种组织，就很自然地应运而

生了。”^{②7}

我们觉得，仅仅从当时有大量破产农民和破产盐民的存在这一点，还很难说明天地会为什么在此时此地产生。

作者也承认“不能认为这种社会条件只在漳州地区存在，或者只是这时才出现的社会条件。”^{②8} 保存下来的大量档案资料中，我们可以看到，秘密结社虽然从清初就存在，但是，大量出现，则是在乾隆二十年以后的事。在故宫博物院明清部所藏《军机处录副奏折》秘密结社项中，共保存了二百一十五种名目的秘密结社档案，其中乾隆二十年以前仅有十六种，乾隆二十年以后则多达一百九十九种。^{②9} 天地会正是在各种秘密结社大量涌现的高潮中产生的。我们不仅需要很好地研究乾隆初年以来社会经济发展的情况，而且要很好地研究当时闽广一带社会经济发展的具体特点。

为了研究天地会产生的社会背景，首先需要弄清天地会究竟创立于什么地方。从现有史料来看，天地会创始人万提喜虽然“籍隶漳浦”，后来，同他的弟子们也曾在漳浦一带传会，但天地会却是创立于广东省惠州府。严烟曾听陈彪告诉他“那在广东起会的是万和尚，俗名涂喜”，^{③0} 陈彪、陈丕，赵明德等人皆提喜最早的弟子，他们也都是“从广东惠州府来到漳州诏安云霄地方传会。”^{③1} 入会较早的张破脸狗，也说赵明德、陈丕等人来自广东，是广东大埔人。^{③2}

正是因为提喜最早是在广东惠州府创立和传播天地会，而且这个说法在天地会内一直流传，所以后来在《西番序》中，也说洪二和尚即万云龙同少林寺僧在广东惠州府石城县 太平县 白鹤林 岳神庙结盟。汪志伊在《敬治化漳泉风俗疏》一文中 也只说：“漳浦僧提喜首先倡立。”这里，也是指提喜籍隶漳浦，而非指他于漳浦创立天地会。

其次,还要弄清天地会的群众基础是哪些人。

以往人们多认为天地会是破产的农民、手工业者,运输工人和流氓无产者为其主要成员,从而联系广大的农民和城市的生产劳动者”。

③ 我们从鸦片战争前有关天地会档案中,看到在闽广一带最初的天地会主要成员乃是以广东沿之江以上水陆交通运输线上的肩挑负贩者和沿线小城镇的小商贩,小本营生者和一部分生活在小城镇里的贫苦群众。下面我们可以从天地会成立到鸦片战争前的大量天地会案例中首领和骨干成员的职业情况加以说明:

肩挑负贩者有:谢志,许水,廖三,陈潭,陈锡宗,黄名璩,黄牛保,郑细观,温细满,周达滨欧亚癸。何帼礼,朱石崇,凌国珍,黄世可,罗远胜,陈琪,廖善庆,翁老八,何经元,邱添其,张文秀,季仁富,张伏丹,余老八,罗道士。

开小店铺者有:李魁升,兰老四,陈纪传,林国才,罗亚耀,张配昌,李训,陆邵炎,麦青,谢罗俚,刁胜和。

耕田及做小本生意者有:陈思名,陈图,蔡妹儿,黄组媛,梁希,梁桢,赖陈志。

城镇中的贫苦群众有时肩挑为生有时佣趁度日者有:叶有升,钟和超,徐亚四,钟大番,杜世明,张世聪,陈礼南,李桂,徐亚三,吴亚八,温华,宋亚二,黄亚惜,周宗胜,黄卜菽,沈惠平,苏义兴,徐亚兰,曾延荣,黄有广,林道径,颜超,肖采章。

向无恒业者有:徐章,蔡光映,曾清浩,赖文膏,关念棕,李顺,叶风轩,邹占魁,许炳,王政清,苏枝高。

耕田度日者有:苏叶,陈苏老,梁奇文,何惠龄,粟金潮,朱德辉,黄得悦,侯二八雄,张管,李万山。

手工业者有:张河章,郑福雍,张效元,熊毛,甘德昌,吴荣茂,

郑司务，姚大斋。

穷苦知识分子有：曾博罗，林崇三，曾阿兰，林琼宴，罗载扬，尹之屏，李老五，陶省三，詹含辉，杨克容，符奇文，林深申，赖元旺。

僧侣，佛性，颜和尚，廖月似，鹭鸶，黄松江，刘敬堂。

家道殷实者：陈烂屐四。

更夫：方振思，

马贩：严亚贵，

兵丁有：黎朝龙，殷龙馗，罗朝洪，黄大章，黄子志。

在台湾林爽文起义军中绝大部分也是肩挑负贩者、小本营生者们。如庄大田部将庄锡舍率部二千余人投降清军时，闽浙总督常青溪：将其中“愿肩挑负贩之业者，即仍听其解散，余下二百五十余人，俱造册另记，给与口粮”。可见一般。

以上所列基本上可以反映天地会的群众基础。由这样一批特殊劳动者组成的天地会的组织，是同乾隆以后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特别是分不开的，特别是闽、粤两省特殊形势密切相关的。

我国商品经济的发展，早在明中叶就已达到相当高的水平。后来，由于明末清初长期战争的破坏，一度凋敝，特别是南方许多工商业城市遭到的破坏更为严重。经过清初康、雍、乾一百多年的恢复和发展，到了乾隆中叶，又重新出现了繁荣的景象，手工业分工的细密，生产规模的扩大，不少手工作坊或手工工场雇佣工人多者达数百人至千人，生产的商品畅销全国各地。这时，农业中各种经济作物生产的发展和粮食商品化程度也日益增长，以至出现了专门种植经济作物的村庄，就以福建为例：“闽地二千余里，原湿饶沃，山田有泉滋润，力耗之原足给全闽之食。无为始辟地者多植茶，蜡，蔴芋，

兰泥、糖蔗，荔枝、柑桔，青子，荔枝之属，耗地已三之一，其物
充足供食用也。今则烟草之植，耗地十之六七”^{②4}。广东和台湾的蔗
田“几与禾田等矣”。大量商品化的农产品和手工业产品的销售，
都需要通过商人的采购和运销，再输往全国各地。当时福建、广东
大部分地区连粮食也需要商人以江浙、台湾贩运接济。很典型的象
上海县小东门外是棉花集散市场，每届秋后，四处的棉农负担求售
者摩肩相接，来自福建、广东的商人“楼舶千百”到这里收购运载
棉花。闽、赣山区盛产菁兰，茶叶，南北商贾来购者常常是“商贾
辐辏，往来为织”。至于江宁的绸缎，松江、苏州的棉布，湖州的
丝，江西景德镇的瓷器，福建、广东的干鲜果品、蔗糖，茶叶及佛
山的铁器，不但遍销全国，甚至运销日本、南洋群岛以至欧州。但
是，清中叶后，经济上出现了一种特殊的现象值得注意。这就是商
业经济的发展乃大大超过了当时商品生产发展的程度。这除了城乡
需要商品不断增加外，一个很重要的因素是封建统治阶级从皇帝，
贵族、官僚至地主，豪商们，经过长期对劳动人民的剥削掠夺，
集聚了大量财富，他们个个是“膏腴万顷，黄金盈万”吃的是山珍
海味，穿的是绫罗绸缎，玩的是海外奇珍异宝。本地的产品还不是
以满足其奢侈愿望，还需要寻求各地的产品甚至海外的高级奢侈品，
这一切都需要商人们不远千里转贩。富商大贾们为了牟取暴利，自
然不惜万里寻求，以致形成了一个伸展到全国各个角落的商业网。商
人们经营的商品除了粮食、布、丝绸、瓷器、茶叶、烟草等之外，
还有山区的贵重药材，如人参、鹿茸、麝香等，海外的燕窝、珍宝、
鸣禽，钟表等奢侈品也是贸易之大宗。适应没落阶级需要的鸦片也
于乾隆三十年代开始不断输入中国了。

上述情形，形成了乾隆中期后中国社会经济的一个特点，商业资

本畸形膨胀，贩运贸易特别发达，尤其在广东、福建、江西等省，这种情况就更为突出。

广东的广州，福建的厦门，很早以来就是国内外贸易的要地。康熙二十三年开放海禁，雍正五年又允许福建民人开洋贸易，这里的商业得到迅速发展。各地运销国内外的商品都集中在广州、厦门等地。“广州的地理形势和中国政府的政策，再加上其他各种原因，使得广州成为对内对外贸易的极盛之地，……中华帝国与西方列国的全部贸易都聚会于广州，中国各地物产都运来此地，各省的商贾货栈在此经营着很赚钱的买卖。”^{③⑤} 厦门“自通洋弛禁，夷夏梯航，云电雾集，鱼盐蜃甲之利，上裕课而下裕民”。“服贾者以贩海为利藪，视汪洋巨浸为衽席，此至宁波，上海，天津，锦州，南至奥夷，对渡台湾。一岁往来数次，外至吕宋，苏禄，实力，噶喇巴，冬去夏回，一年一次，初则获利数倍至数十倍不等，故有倾产造船者。然骤贫骤富，容易起落，舵水人等藉此为活者以万计”^{③⑥}

当时，广州乃是以贯穿全省的东江，北江，西江三江汇合处，因而通过这三条江及其支流可同近邻各省水陆交通线相联，成为全国进出口货物的集散地。各地货物进入广东后，几乎都可经由这三条江运至广州，而从广州进口的货物，也都通过三江运往全国各地，实际上形成了联结整个南中国的水陆交通运输网。在这一带贩运贸易极为发达，各地穿苦的人们，在当地无以为生，被迫背井离乡，来到这个水陆交通线上谋生。有的以肩挑负贩为生，有的在沿江当纤夫，也有的在小城镇开小店铺，摆地摊做小本营生，人数是很多的，就以广州溯北江以上经韶关转入陆路湖南湘潭这条交通线为例：“凡外国运来货物，至广东上岸后，必先集湘潭，再分运至内地。可非独进口货物然，中国丝茶之运向外国者，必先在湘潭装箱，然

后再运广东放洋，以故湘潭及广州间，商务异常繁盛，劳动工入肩货来至于南风岭者的下十万人。^{③⑦} 乾隆七年时，两广总督庆复就奏言：“就粤而论，籍外来洋舶以资生计者约数十万人”。

这些人中，大多数又都是来自福建、广东两省，因为这两省不但是连接中外贸易重镇，同时素以山多地少人稠著称，特别是广东的惠州，潮州，福建的漳州，泉州。“闽土素称下下，而漳以海隅介居闽粤，依山涉阜，林麓荒焉，杂以海埔斥卤，溪涧流潦，决塞靡常，称平野可田者十之二三而已”。^{③⑧} 闽广人稠地狭，田园不足于耕，望海谋生，十居五、六”。在广东潮州“民力耗多为上农夫，余逐海洋之利，往来乍浦，苏松如履平地”^{③⑨} 泉州人入山谷贫瘠虽就耕无地辟，州南有海浩无穷，止岁造舟通夷域”，“上则吴浙，下则粤之潮高，如数月海船不至，则待哺矣”。^{④⑩} 因此，这一带地区多数男子世代不务农，经常结伙出外，或到水陆交通线上谋生，或冒着生命危险渡海到台湾或南洋各地经商、做工。

这些人生活是十分不稳定的，任何政治上的变化，社会的动乱，都会影响到他们的生活和生存。乾隆以来，商品经济的发展，冲击着封建基础，官场的腐败，政治的黑暗，日益暴露出封建统治的腐朽和没落。清统治者害怕中国人民同外国接触将危及其统治，乾隆皇帝便开始推行了闭关锁国政策。不但对外国商人采取了种种限制，并于乾隆二十二年下令关闭厦门、宁波等地通商口岸，只许广州一口通商。对内地商人出海贸易也进行种种限制。禁止丝绸、绸缎、绵绢，茶叶出口，还严禁铜铁等矿产输出。大大影响了对外贸易，严重破坏了商业活动。再加上贪官污吏的任意加税加捐，使一时极盛的贩运贸易，受到很大打击。曾经一度十分繁荣的福建商业，由于厦门口的关闭也逐渐凋敝了。许多大商人迁移到上海，广州或其他地方

去，却使一大批“藉^藉此^藉为活者数以万计”劳苦大众的生活顿时陷入绝境。至于广州一口也因为乾隆后沿海一带经常出没海盗，~~劫掠~~商船，大批商人裹足不敢出洋，广州的贸易也受到严重打击。于是生活在福建，广东，江西，湖南等省的水陆交通运输线上的百十万人推向了失业饥饿的深渊。

本来这一批人都是生活在异乡，常常要遭到意想不到的欺压和，特别在官场腐败，政治黑暗的情况下，就更加痛切地感到孤立无援的痛苦，极希望大家团聚在一起，互相支援，互相帮助。现实的处境迫使他们更加迫切要求组织起来抗暴险恶，争取生存的权利。天地会这个秘密结社，就是这种特定的社会条件下的产物。

我们若查阅一下天地会初期活动的地方，则恰恰与这一带水陆交通沿线的中小城镇相吻合，如广东的河源，博罗，永安，增城，归善，东莞，~~莞平~~，~~潮平~~，惠来，善宁，德庆，肇庆，新会等县；福建的崇安，~~阳~~，~~光泽~~，~~邵武~~，~~建宁~~，~~漳浦~~，~~诏安~~，~~漳州~~，~~泉州~~，~~同安~~等县；广西的贵县，桂平，平南，藤县，苍梧等县；江西的南安，赣州。台湾的淡水，凤山，诸罗，漳化等地。这种情况绝非历史的巧合，而是表明天地会所以在这些地方发展起来，正因为这些地方乃是水陆交通线上苦力者们活动和谋生的地方。

三、天地会发展的特点

天地会与一般以破产农民为主体的秘密结社相比有不少特点值得进一步研究。以下我们仅提出一些初步看法。首先：天地会内的宗教迷信色彩比较淡漠，这是因为天地会成员经常是走南闯北，见闻广，思想比较朗，较少保守与迷信，他们主要需要现实的人与人之间的团结互助，抗恶除暴。而不是寄希望于虚幻渺茫的未来。所以他们

不以宗教迷信作为团结会众的纽带，而是用结盟拜把的形式，用严格的誓言和讲究义气使用等作为维护天地会内部团结和约束成员去完成某项事业的纽带。因为不信佛不信邪只是指天为父，指地为母，所以取为会名。天地会的誓言和结盟仪式虽然随着天地会的发展不断变化，但总不离开最初立会的本意，如“在僻静地方，设立香案，排列刀剑，会员在刀下钻过，即传给暗号，结为兄弟，连父母妻子都不许告知”，结盟时用针刺指取血，滴入内，入会者分盟誓，誓言一般都是“一人有难大家相帮，如若负盟，刀下身亡”。④

嘉庆以后，结盟仪式和誓言逐渐复杂，但基本上还是钻刀，或现血酒，誓言是忠心义气刀下过，不忠不义剑下亡”。⑤到了嘉庆十一年后，开始出现带有迷信色彩的仪式，如“供以前洪二和尚万提喜牌位，有的还供奉“五祖”牌位，有些地方的会只受到其它秘密结社的影响，结会时供奉观音，土地，关公甚至是立阴教，阳盘教，也出现吃念佛等形式。但这些仪式未得到发展，很快就自生自灭了。

天地会这种结盟信式和宣誓对于巩固和发展组织，起了一定的作用。我们在有关天地会档案资料中，很少看到天地会成员接受清政府的招抚或投降变的情况。在永安天地会起义时，起义者甚至处了前来招降的绅代表，尽管当时起义者处境已十分危险。台湾林爽文起最后前后失败了，但是天地会的骨干分子和重要成员叛变自首的也不多。其他的多次起义也是如此。清政府对付天地会的办法除了重兵镇压起义之外，就是购觅线民打进天地会之内，或煽动漳泉，闽，粤人民的和，从而达到破坏天地会组织的目的。正是由于会员宣誓严守会规，连父母妻子都不相告，所以在台湾林爽文起义时，居然出现了有的人父兄是天地会会员，而子弟却是义民